

第 5 集

文史资料研究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湖南省益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
1984.6

目 录

益阳市文史资料

第五期

- (1) 益阳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
- (2) 益阳的行政区划
- (3) 益阳的物产
- (4) 益阳的名胜古迹
- (5) 益阳的民间艺术
- (6) 益阳的方言
- (7) 益阳的传说
- (8) 益阳的戏曲
- (9) 益阳的曲艺
- (10) 益阳的杂技
- (11) 益阳的武术
- (12) 益阳的体育
- (13) 益阳的卫生
- (14) 益阳的教育
- (15) 益阳的文学
- (16) 益阳的史学
- (17) 益阳的哲学
- (18) 益阳的宗教
- (19) 益阳的民俗
- (20) 益阳的礼仪
- (21) 益阳的服饰
- (22) 益阳的饮食
- (23) 益阳的居住
- (24) 益阳的婚姻
- (25) 益阳的丧葬
- (26) 益阳的岁时
- (27) 益阳的节令
- (28) 益阳的节气
- (29) 益阳的节气歌
- (30) 益阳的节气谚语
- (31) 益阳的节气习俗
- (32) 益阳的节气传说
- (33) 益阳的节气故事
- (34) 益阳的节气诗词
- (35) 益阳的节气对联
- (36) 益阳的节气谜语
- (37) 益阳的节气笑话
- (38) 益阳的节气歌谣
- (39) 益阳的节气谚语
- (40) 益阳的节气习俗
- (41) 益阳的节气传说
- (42) 益阳的节气故事
- (43) 益阳的节气诗词
- (44) 益阳的节气对联
- (45) 益阳的节气谜语
- (46) 益阳的节气笑话
- (47) 益阳的节气歌谣
- (48) 益阳的节气谚语
- (49) 益阳的节气习俗
- (50) 益阳的节气传说
- (51) 益阳的节气故事
- (52) 益阳的节气诗词
- (53) 益阳的节气对联
- (54) 益阳的节气谜语
- (55) 益阳的节气笑话
- (56) 益阳的节气歌谣
- (57) 益阳的节气谚语
- (58) 益阳的节气习俗
- (59) 益阳的节气传说
- (60) 益阳的节气故事
- (61) 益阳的节气诗词
- (62) 益阳的节气对联
- (63) 益阳的节气谜语
- (64) 益阳的节气笑话
- (65) 益阳的节气歌谣
- (66) 益阳的节气谚语
- (67) 益阳的节气习俗
- (68) 益阳的节气传说
- (69) 益阳的节气故事
- (70) 益阳的节气诗词
- (71) 益阳的节气对联
- (72) 益阳的节气谜语
- (73) 益阳的节气笑话
- (74) 益阳的节气歌谣
- (75) 益阳的节气谚语
- (76) 益阳的节气习俗
- (77) 益阳的节气传说
- (78) 益阳的节气故事
- (79) 益阳的节气诗词
- (80) 益阳的节气对联
- (81) 益阳的节气谜语
- (82) 益阳的节气笑话
- (83) 益阳的节气歌谣
- (84) 益阳的节气谚语
- (85) 益阳的节气习俗
- (86) 益阳的节气传说
- (87) 益阳的节气故事
- (88) 益阳的节气诗词
- (89) 益阳的节气对联
- (90) 益阳的节气谜语
- (91) 益阳的节气笑话
- (92) 益阳的节气歌谣
- (93) 益阳的节气谚语
- (94) 益阳的节气习俗
- (95) 益阳的节气传说
- (96) 益阳的节气故事
- (97) 益阳的节气诗词
- (98) 益阳的节气对联
- (99) 益阳的节气谜语
- (100) 益阳的节气笑话

益阳市政协商会文史资料研究会

一九八四年八月

目 录

幸福的汇报 亲切的教导	仇雨夫 (1)
回忆孙中山先生奉安情况	刘旦生 (5)
曾三同志还乡访问记	奚范彰 (8)
周立波同志二、三事	张俊德 (12)
刘元林赠诗袁铸人	龙叔韬 (16)
同难友韩子栋重访王家大屋集中营怀旧	曹毓嵩 (18)
震惊全省的益阳“双十血案”	陈乐群 (22)
益阳花鼓上北京	郭莲英 (29)
曹明阵祸益点滴	何储杰 (36)
益阳腐乳之由来和发展	张晓立 (41)
林柏森传略	林煦春 (44)
周明生先生传略	姚松泉 (51)
忆戴师韵珂	刘经校 (62)
我所知道的戴韵珂先生	李梦贤 (66)
喻名英事略	蔡济湘 (71)
花鼓戏前辈花旦郭玉钗	陈启烈 (75)
悼念国际友人夏义可先生	陈朝荣 (83)
旧闻拾遗 (四则)	
伤兵、交警大“闹”元宵节	金春华 (89)
“商女不知亡国恨”	奚范彰 (92)
“一〇三毒”的由来	奚范彰 (93)
县太爷查赌挨打	张俊德 (94)

幸福的汇报 亲切的教导

仇雨夫

益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几次约稿，要我撰写六十年代初胡耀邦同志来益阳市视察工作、听取市委汇报情况的回忆录。那是一次幸福的会见，耀邦同志的亲切教导，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对我市加强两个文明建设仍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更应该认真记下来。但又考虑到，时过二十多年，有些情况记的不准确了，恐怕写不好。这个想法近几个月来一直在翻腾着。最近我走访了当时一起参加汇报的胡丰庆等同志，并到市档案馆查阅了有关资料，写成了这篇稿件。时间久了，遗漏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望有关同志补充指正。

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在六十年代初期曾三次来益阳市，第一次是一九六〇年秋去常德时路过益阳；第二次是同年十二月上旬来益阳，曾在市工人俱乐部向全市干部作形势报告；第三次是一九六一年三月。

一九六六年三月的那一次，市委预先接到通知，说胡耀邦同志将到我市视察，了解我市地方工业的情况。市委决定要我作准备，向耀邦同志汇报。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这是头一次，我有些着难，有些紧张。三月十九日那天，天气晴朗。市委院内，柳枝泛绿，春花含苞待放，庭院

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等待耀邦同志的到来，上午八时正，耀邦同志在市委书记张麟珍同志的陪同下，健步走进二楼会议室，他和晋亲切地与会者一一握手，寒喧片刻后，他微笑着说：“哪位先谈呀？”麟珍同志作了介绍，我接着汇报了益阳市地方工业产销情况。耀邦同志边听边插话，不时概括分析，启发引导，对我市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他在指示中常举些生动的例子引人发笑，但回味无穷，又感到其意义之深。当我汇报到手工业生产情况时，耀邦同志说，益阳手工业享有盛名。你们对中央领导颁发的手工业《三十五条》要好好学习，认真领会贯彻，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特别要注意保持和发展传统手工业品的生产，作好大工业的助手，在发展整个国民经济中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耀邦同志赞扬益阳铁锅很好。他说，有个地方生产的铁锅壁厚质量差，群众反映：“半天烧不熟，烧熟了一天不得冷。”大家听着都笑了起来。耀邦同志对铁锅生产还提了一些细节问题，我一时答不上来，临时把湘中锅厂曾小牧厂长找来，从铁锅的生产工艺流程到工厂的经营管理作了详细回答。耀邦同志说，益阳所产的铁锅又叫“广锅”，相传源于广东。现在你们产品质量好，供销渠道畅通，大的小的，各种型号都可多生产一点，今年计划二十万口，明年争取三十万口，尽量满足城乡人民的需要。

当我汇报到手工业原料问题时，耀邦同志说，这是个大问题，必须在搞好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真规划，把原料问题解决好。他说，益阳竹器颇有名气，水竹蔑席是益阳特产之一，你们能否在郊区开辟水竹原料基地，这样就比较主动了。当时市手工业管理局局长胡丰庆同志在座，听了很受启

发，会后贯彻了这一指示，在郊区石壁湖开辟了一个近三百亩的水竹基地，弥补了外地进料的不足。同时手管局还将原三十几家竹席手工业工厂加以整顿，迅速恢复生产，并发展这样的手工业厂、社、组共一百一十家。

当汇报到工业市场和郊区副业生产问题时，耀邦同志风趣地说，我最近到过益阳县，与县委同志商量，说了，“益阳”两个字照过去的写法是二十二划。可以来个二十二字方针，三句话，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争取农业大增产，争取工业大发展。可不可以加两个“大”字？全国冒提，只说争取好收成，争取农业丰收。因为中央考虑，登在报纸上，中国人、外国人都看到了，秋后一看，丰是丰收了，但是丰产的幅度不大。因此还是留有余地好，免得交不了帐。你们可不可提？也可以不登报，口讲，为了鼓干劲。什么叫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一切”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县社队户，男女老少，党政工团，东南西北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

耀邦同志对我市各项工作极为关心，并且着重提出一切工作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部门，各行各业都要为这个中心服务，他提倡各级领导同志在工作中做到“三多三少”，即调查研究多，指挥命令少；具体帮助多，电话会议少，耐心教育多，要态度少。工作中要注意点面结合，以点带面，抓好带倾向性的共性问题。

最后，耀邦同志谦虚地说，上面来的同志有两条，“经验不多，情况不熟”，这是弱点。如果不调查研究，不很好地与基层工作的同志商量，也可能犯主观主义、犯瞎指挥的错误。不管哪里来的人，他们说对了的就照办，不完全的要补充，错误的就不办。毛主席讲了，不要迷信，北京来的讲得不

对的，也不能那样办。

汇报会议进行了一整天，到会同志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次日上午，耀邦同志和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曾德林等领导同志同在家的市委委员一起合影留念。这张珍贵照片，我们一直把它珍藏保存了下来。

六十年代初，我国正处于暂时困难时期，中央很多领导同志到地方、到基层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耀邦同志正是在这个时候到益阳的。他给我们作报告，亲自听我们的工作汇报，同我们一块商讨论问题，帮助我们提高认识，他那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精神和作风，使我们终身受益，永记不忘。

回忆孙中山先生奉安情况

刘旦生

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二日，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病故于北京，灵柩暂安放北京碧云寺。

一九二八年，南京政府于南京下关起，建筑一条中山大马路直到紫金山下。在紫金山麓，开辟坟地，准备迎接孙中山先生遗体安葬于此。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二日，为“总理奉安”之期，那时，我在南京马标中央陆军教导队当学生，参加了护灵团。护灵团团长黄慕松。

一、迎接情况

在总理奉安之日，护灵团在浦口乘专车到北京。北京车站已准备了两列扎了孝花的专车，于六月十二日中午启灵。孙中山先生的灵柩安放在第一列车上。总理夫人宋庆龄及孙科等亲属伴灵。护灵团在第二列车上，相隔只有一站距离，护灵专车经过沿途火车站，那里的人们群众纷纷整队肃立，焚香秉烛悼念，专车不停，沿线的火车都让站。翌日上午专车到浦口，由中山舰迎接灵柩过长江。到了下关码头，乐队奏哀乐，护灵团排队在码头上，举花敬礼。水晶棺材用铜丝做的灵罩盖上。十六个穿孝服的丧伕抬着徐徐而行。乐队奏哀乐前行，护灵团走在灵柩后，照哀乐的拍子正步前进。步

行进城后，沿中山大道前往新街口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那里重新布置了灵堂。其中没有灵台，灵柩抬到这里，拉开了灵罩并把它放在灵台上。我亲眼看到孙中山先生的遗体睡在水晶棺材内，面目如生，身上穿着青色中山装，盖着国民党青天白日党旗。脚上穿着黑色白底的布鞋。

二、各国使节悼念

中央党部大礼堂已改为孝堂。宋庆龄夫人及孙科等守灵。灵案上香烟缭绕。各国使节身穿大礼服按照安排秩序，井然进入灵堂，至灵柩前恭读祭文之后，再行三鞠躬礼，然后退三步而出，灵柩停放三天，接着各省代表相继前来悼念。

三、灵柩送上紫金山墓地安葬

六月十六日，天气炎热，上午八时开始，护送灵柩上紫金山墓地，灵柩仍用灵罩罩上，十六名丧伋抬送。灵柩前用白绸带围成一圈，孝家及亲属都穿孝服执绋，孝家子女儿孙执孝棍一概步行。乐队奏哀乐，护灵团走在灵柩之后，仍然按照哀乐拍子，正步前进。在中山大道上，各省省长代表全省人民肃立在悼念牌坊前，静默致哀。湖南省省长何健在悼念牌坊横额上写有“衡岳崩兮”四字。两边的挽联记不清了。各省的牌坊约隔二百公尺一个，代表们都在牌坊下面摆起香案，焚香秉烛相迎并致悼词、灵柩稍为停留一下，大路两旁的群众站得满满的，灵柩经过，都鞠躬致哀，多有哭泣者。行至下午三时才达到紫金山墓地。护灵团在上山的二百八十级石阶两旁，列队举枪致敬。灵柩进入墓地礼堂，墓穴大门

打开，墓穴内有白色大理石灵台，水晶棺材安放在台上，四周围有黄色铜栏杆。在栏杆外可以看到孙总理的遗容，

回忆孙先生奉安情况，不觉已五十四年，有些细节也记不清了。解放前，我在南京住过多次，常去紫金山，那时中山陵没有得到必要的保护和修整，树木凋零，石阶开裂，杂草丛生。南京沦陷时，更被糟踏得不成样子，陵墓礼堂外面的两口尺高的大金缸是山东掖县军阀刘珍年送的，没有了。有人说是日本人抢走了。还有一对三丈高的华表也不见了。一九八一年十一月我参加益阳市统战部组织的参观团到了南京，有机会重谒孙先生陵墓，中山陵已修葺一新，紫金山麓，树木参天，石阶平坦如垠，并增添了三个墓亭，更显得雄伟壮观了。山下过去是不毛之地，现兴建不少为旅游者服务的建筑设施，成了闹市。国内外前来谒陵观光者络绎不绝，这是旧日难以比拟的。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三十多年来，国家富强了，人民生活安定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实现了。先生九泉有知，当可含笑而无憾。

曾三同志还乡访问记

吴范影

桃花仑的桃花开过了，树树枝枝，添了许多新绿。青山抹着彩霞，路边垂着翠柳，这撩人春色，引我步入益阳地委第二招待所的大门，访问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曾三老前辈。

他的秘书带我进去，房子里坐满了小字辈，七十八岁高龄的曾老，精神矍铄地在和他的侄儿侄女们叙话。旁聆谆谆教诲，我亦如坐春风。我把两份地方刊物递给曾老，上面转载了他青年时代撰写的两篇文章。曾老接过，重温峥嵘岁月，对旧作倍感亲切。他回忆道：“《中国民族的出路》这篇文章，是一九二四年在长郡中学读书时写的，登载在《益阳学友》第一期上，《诉苦歌》是大革命时期为益阳家乡间革命写的通俗宣传品。曾老说到这里，用地道的乡音爽朗地背诵起来：“不打鼓，不打锣，听我唱个诉苦歌……”。我可真愣住了，七十八岁高龄，五六十年往事，一气吟来，竟历历如昨，我真敬佩他那惊人的记忆力。是的，益阳至今还流传着办农协协会那年，农民正月十五上街闹元宵，就是用这首《诉苦歌》做地花鼓的词儿呢！

趁曾老与他的大侄子谈话的时候，我便与他的秘书聊开了，他的秘书告诉我，曾老这次专程从北京来湘，是以校友

身份参加长郡中学八十周年校庆的。四月十四日在长郡参加校庆活动，今日回益阳家乡往医院探望其胞兄曾海楼老人，明天一早就去长沙。秘书还告诉我军经汉口时，曾老生病了，劝他回北京，他坚持要来长沙。我听了油然而生敬意。曾老不忘母校，热爱集体，热爱生活的美德，真值得青年一代学习。

我和他的秘书拉话时，曾老叫着我，教育我写文章要实事求是，要做调查研究，特别是听别人说的，尤其要如此。还指出，过渡的地方不要想当然，坏要自圆其说。他说：“昨天看了《长沙晚报》上一篇文章，有点气不过，那位作者说一九二五年前后，廖仲恺先生曾与我联系，说我输送过一些人给廖先生。没有这回事，我那时是个学生，才十八岁年纪，廖先生五十多岁了，他是革命老前辈，我有什么资格向他介绍人。”我聆听曾老的教诲，他那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精神感动了我，不由得想起曾老的子侄们告诉过我的三件往事。

曾老最小的儿子幼云同志曾经写过一篇回忆他父亲早期革命活动的文章，曾老知道了不让见报，并告诫子辈说：“我在世不能登，死后也不能登，哪里有儿子捧老子的。”曾老就是这样以身作则，谦虚谨慎，于是我便向曾老问起幼云同志的情况。

曾老不胜感慨地对我叙说过去的事情：宁汉合流之后，曾老机警地逃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搜捕，从武汉出走，辗转来到上海，夫妻俩坐机关做地下工作。后来上级通知他到苏区去，曾老只身离沪，幼云的生母正怀孕幼云，没有同行。到苏区后，曾老接到党组织秘密传来的幼云出生后的照

片，很欣慰地一直珍藏着，可惜这张照片在征途中遗失了，尔后一直与幼云母子失去了联系。在延安时，有一位知情的，在部队做医务工作的女同志，告诉了关于幼云母子的情况：幼云出生后，他的生母奉上级指示散了朱义才同志的交通。当时在白色恐怖下，党的地下组织接连遭到破坏，朱义才同志和幼云的生母离开了上海，把幼云送到朱的老家河南隐蔽下来，由朱的母亲抚养。后来，朱义才同志和幼云的生母先后被敌人杀害了，留下了曾老的亲生儿子幼云和朱义才同志的亲生女曼丽两个幸存者。朱家悉心保护和抚养这两个革命后代，幼云长大后并不知道自己姓曾，连朱的母亲也不知道幼云姓曾，因为当时朱义才同志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朱母。这位在部队做医务工作的女同志是朱的亲戚，把幼云母子的情况告诉了曾老以后，曾老毅然承担抚养革命后代的责任，把朱义才同志的亲生女儿曼丽带到身边作为自己的亲生女儿，至于幼云，曾老念及朱家没有子嗣，为了安慰烈士一家，就让他姓朱并留在河南朱家。曾老讲述完了之后叹了口气说：“我们这个革命家庭的结合来之不易啊！”现在幼云同志在河南工作，曼丽同志在京担任新闻记者。曾老和沈老晚年儿孙绕膝，革命后继有人，二老对众多子女都很钟爱，儿女辈也都尊敬父母。一家和睦相处，堪称模范家庭。

曾老没有继续谈下去，也许是对同志、对亲人的怀念和对幼子的怜爱吧？我很想把这个感人的故事写完，让我插叙一段有关的听说。

这是今年春节曾老的大侄子告诉我的：解放后，商邱的同志把幼云的来历告诉了朱家和幼云同志，幼云随即进京，父子见面。幼云同志曾请示改姓的问题，曾老爱抚地对他

说：“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爸爸，保护和养育过你的人都为革命牺牲了，朱家茹苦含辛，好不容易把你抚养成人，你一旦离开他们，他们会伤心的啊……”就这样，曾老众多儿女之中，唯独幼云同志仍留在河南朱家，姓朱不姓曾。我一边回忆这番感人肺腑的话，一边仰视面前慈祥的长者，不禁心情激动，人们常说：“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的意思是指父母对儿女的私爱吧？可曾老把这句话赋予了时代的涵义，把对子女之爱升华到了及人之爱的高度，多么高洁的德操和无私的胸襟啊！

这时，医生送药进房，一看表，竟误了一点多钟。我不便再干扰曾老的休息，怀着崇敬的心情，告辞了这位可亲可敬的长者。

周立波同志三專三強

张金海

……我没有见过周立波同志，可是他的名字却早为我所熟悉。

不是一九四四年，日寇进犯益阳，我避居在南坝镇。当时县妇女干事姚陵华亦随内县属党政机关来镇上，住在我的正对门。她同我的前婆要好，且有些瓜葛之亲，因此我们两家朝夕相处如一家人。

姚陵华同志有两个男孩，大的叫周露意，小的叫周雅可，都长得十分聪明伶俐。她请我给孩子们教点英语。她介绍说，孩子的爸爸叫周立波，是上海劳动大学社会学学院毕业的，英语也学得很好。很久没来过信，只知打鬼子去了，不知人究竟在哪儿。

日子长了，相交渐深。才知道她丈夫在共产党那边工作，会写文章。本名叫周少仪，周立波是他所用的笔名之一。当时我生诧异，心想，姚陵华是国民党员呀，而她丈夫竟是共产党，难道国民党部竟未察觉吗？可能是她守口如瓶。我不解，只得放在心里。

一九四六年，美蒋玩弄和谈伎俩，三人小组在汉口德明饭店谈判。中国共产党方面以周恩来同志为首席代表，周立波同志随同前来担任翻译。这时姚陵华得信来到汉口，我当

时在汉口任伪《中央周刊》湖北分社社长。就要求我为她掩护。我给了她一个分社干事的名义，发给她证件与印章。她们夫妻会面了。关于谈判内容，她既不谈，我也不便过问，涉及公务，她也不知道。能公开的消息，反正是会见报的。

在万分艰险的战争年代里，周立波同志毅然以革命利益为重，忍别妻儿战斗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之中，正反映了一个革命者的崇高思想和情操。

五十年代，周立波同志为下乡体验生活，收集积累创作素材，曾回益阳乡下住了一段时间。现在我市技校的温菊生同志当时奉组织之命，负责周立波同志的保卫工作，两人经常在一起，他向我讲了许多当年周立波同志的生活、工作情况。

一九五五年冬，周立波同志和他的爱人林兰同志带着一个小女孩及裸姆回到益阳市郊区大海塘，租社员邓海芝的三间平房住了下来。他夫妇俩着灰卡叽制服，行装十分简单，只是书刊报纸很多。他们生活俭朴，作为一个很有名望的作家，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连槟榔也不吃。五人开餐，多是家常菜，林兰是北京人，也跟着喜欢吃芋头禾子。那时大海塘没有电灯，他们备了三盏小煤油灯，正好每间房一盏。每当出去时，不管有多久，总得将灯拧小，回来再拧大，每次这般仔细，生怕浪费一点煤油。

刚一住定下来，他就着手写一部关于反映农业合作化的小说。为了体验生活，他深入到贫下中农中去访问。由于他平易近人，很快和许多社员交上了朋友，社员们也络绎不绝地来访问他，向他反映在党的领导下，农民热火朝天搞合作化，由初级社转高级社的过程。读过《山乡巨变》的人都知道

道，这是我国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废除几千年的私有制，建立集体所有制斗争过程的缩影。小说以益阳县邓石桥为背景，歌颂了波澜壮阔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可以说是继《暴风骤雨》之后，又一描写农民和私有制彻底决裂取得斗争胜利的巨型小说。

周立波同志在益阳期间，工作需要，曾任我省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还兼任了桃花仑乡党委付书记。他经常参加各种会议，了解情况。林兰同志是《祖国花朵》的作者，北京市少先队的总辅导员。她热爱祖国花朵，经常在桃花仑为少先队员讲课，聪慧活泼的少年儿童们，个个喜欢和她做朋友，爱和她在一起。

在伟大的社会变革中，一个体验沸腾生活的作家，的确是够忙的了。然而周立波同志并不因为忙而忽视组织观念。他遇事请示党委，甚至连吃面食的问题也曾请示过。他和林兰同志一到益阳，就建立起和温菊生同志在一起的三人党小组。只要他人在益阳，就从未间断过组织生活。他参加开会、听报告，总是用笔简要地记笔记，只听、只记，从不干预别人。

大海墟乡有初级社和高级社。有一次，高级社某社委结婚。周立波同志被请作佳宾。他欣然应邀不辞劳苦，翻山过岭到了新郎家。社员们欢迎他献词。他大讲育秧、插禾、田间管理等农业生产技术。突转话题指着门楣上的“喜”字说，喜就是福，男婚女嫁是喜事，俗话又称有孕为有喜，二人结婚生思女，叫做双喜。他一口普通话，即善于运用故乡方言，把辞海里韦庄注释的喜字，讲得如此通俗，博得满堂客人阵阵的欢笑声和掌声。不久，他发表了一篇文章，为新

事新办大唱赞歌。

周立波同志热爱祖国的山山水水，反对乱砍树木。他曾向市委张麟珍书记建议搞好绿化，保持水土。张书记采纳了他的建议，亲抓绿化工作。在大跃进时，会龙山的树木得到了认真的保护。益阳县委也根据他的建议，修起了梓山村水库。

周立波同志在益阳落户期间，曾和中央同志出国访问过，只一个多月便回益阳来了。在他出国临时时，他爱人送他上车，依依惜别，互道珍重，直到车轮滚动，疾驰而去，看不到车影，才转身回来。他俩在创作上各具特色，各有成就。但两人从来都是互敬互爱，彼此尊重的。就连打算买点什么东西，也是商量了再办。一家人生活得极为和谐。这种无声的教育，不但给孩子很好的陶冶，也给予了周围的邻居很好的影响。

一九五七年，周立波同志一家回到了北京。不久，《山乡巨变》这部小说问世了。故乡人民特别感到亲切。他的作品，爱憎分明、思想深刻，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笔调轻松幽默，语言朴实富有地方色彩。真不愧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卓有成就和深远影响的作家。

刘元林赠诗袁铸人

龙叔楷

刘元林同志（别号经炼）桃江人，一九二四年在益阳县兰溪镇（柳塘）华林寺完小与袁树人同志同事。我与刘是同乡，经他介绍，我当时在千家洲枫树湾小学临时任教，时相往来，因得与袁树人同志相识。几人常在一起谈论时事与革命形势，对我很有启发。刘元林同志受袁树人同志的思想影响，参加革命活动。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先生在韶关成立大元帅府，积极准备北伐。革命浪潮冲击全国。袁树人毅然赴广东韶关（曲江）。林写诗一首赠别，此诗刘曾与我共同斟酌过，故尚能记忆：“迢迢千里赴岭南，书生报国气非凡。忧时慷慨谈长夜，壮志相期奏凯还。帆影望穷资水岸，文旌径赴曲江湾，那日柳塘重聚会，共裁桃李已成山。”此后不久，我即外出从军，再未见到刘元林同志了。现在时间已过去整整六十年，刘元林青年时代豁达潇洒的风姿，仿佛尤在眼前，缅怀先烈，不禁怆然。

大革命后，我从长沙送母亲回家，专程去看了刘元林同志的爱人文女士。当时她被桃江恶霸曾艾云赶出自己的家园，移住猫形山刘姓祠堂的房子。她谈起一九二六年益阳普遍建立农民协会，并成立了县级革命政权，袁树人同志担任中共益阳县委书记，刘元林任县府秘书。“马日事变”后，

袁树人被恶霸地主益阳县团防局长曹明阵杀害，刘元林得农民帮助，潜往华容教书，继续进行革命工作，历尽艰险，不久积劳病故。文女士殚精竭虑抚育三个儿子鹏洲、鸿洲、骋洲，受尽了地主恶霸的歧视迫害。

刘元林同志早年参加革命，他的革命经历应该收集整理，今就回忆所及，追述一、二片断，以表彰先烈为革命献身的光辉业绩。

同难友韩子栋重访王家大屋集中营故址怀旧

曹毓澔

序：一九三七年余于重庆中央警官学校读书时，秘密加入“社会主义研究小组”，组长李坚白与重庆《青年晚报》主编、地下党员谢冰莹常有联系。在他们的影响下，学习革命理论，从事地下活动。一九三八年春我潜离重庆，奔赴延安，至陕北洛州被阻，不得已折回武汉。因人告密，警校当局以“鼓动学生投奔延安”之罪下令通缉，不幸于汉口被捕入狱。旋因日寇深入，武汉吃紧，一九三八年夏，国民党当局将此政治犯仓皇转到湖南益阳市南郊金银山王家大屋囚禁。离开武汉时，同船难友约两百余名，船至益阳，停靠在裴公亭下，碧津渡口。所有“囚犯”均两人一排用铁镣扣系手脚。从河边码头到秀峰湖，山下，路旁，湖边遍布岗哨，架设机枪，如临大敌。我被送进王家大屋东侧牢房的第一间，同室有东北军军长黄显声将军和一位捷克青年米莱斯。这位国际友人可能是第三国际派来我国从事革命活动的。西侧厢房是监狱办公室及特务、监审人员的住室。

牢房戒备森严，特务常在门外监视偷听。黄显声将军坚决主张停止内战，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他常对我讲些抗日道理。为躲避特务耳目，他曾对我说“你英语阅读能力还可

18

以，口语差一些。以后我们干脆练习英语对话，让他们什么也听不懂”。不久，我被转移到另一牢房，同室有两名西北军军官，一是杨虎城将军之副官长阎继明，一是副官张醒明。两人在狱中经常高声大骂蒋介石，并向我们讲些西安事变停蒋的故事。阎说，“蒋介石被俘后，杨虎城将军派我负责安排蒋的生活。蒋想拉拢我，故作姿态，问我的姓名，家住哪里，家里有几个人等等。我说，这些事你不要过问，我也懒得理他。”

转移牢房只有三日，监狱长召我训话：“你莫要听他们（指阎继明、张醒明）的，他们都是西安事变要犯，你的情况不同。你还是回原牢房去。”于是我又回到了原室。

狱中生活，备极恐怖。白天有难友被提审、受刑；入夜，气氛更为紧张。每逢此时，同室难友相依而坐，相互鼓励宽慰。有老犯告余，此处行刑，不同一般，手段极为残忍，甚至有受刑未死被活埋者。外人不快，误入牢营警戒线，也难活着出来。特务暴行，令人发指！

武汉失守，长沙更为紧张，监狱正酝酿再度转移，在烽火纷乱中，诸难友或解或洗，命运难以预知。黄显声将军谓我仅以潜奔延安一事获罪，或可获释。乃嘱余：“你如获释出狱，能否设法将我的情况转告我原在北平协和医院工作的妻子。”然余出狱后蜷居乡里，且其时北平早已沦陷，长者之托，无由复命，思之不胜慨然！

监狱转移（迁至贵州息烽）前夕，监狱长复召余训话。余据理申辩：“我只不过是想去延安抗大学习，没有去成，以后不去就是了，又没犯什么大罪。”监狱长说：“我执行上级命令，准备释放你，但你要知道，你是有罪行，还有新的问题。捉你的通缉令并没有撤销。出去后不要再东跑西跑

19

回家好好读书，找点事做。”八个月囹圄生活，终于结束。

一九八三年贵州省委顾问韩子栋同志（小说《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偕同《红岩》作者杨益言来我市访问。盖韩老四十五年前亦曾系狱于王家大屋，此行意在访旧。益阳市政协约余陪同接待，联袂重访监狱旧址。相见之下，老泪纵横，须发皆白，犹年七十五，余年七十八，别后四十余年，世事沧桑，王家大屋原形已不可复识，同难诸友多已惨遭杀害，除如韩老所知，米乐斯已回祖国外，韩与余为仅存之余生乎！

近年来，市政协同志多次嘱余撰稿，记述当年囚禁于王家大屋情况，无奈老病相乘，难以执笔。今有幸晤韩老，促膝倾谈，感慨万千，乃以七言诗体纪述同难诸友狱中斗争经过，并为序，以应政协领导之命。

难友重逢四五霜，悲风泣雨话沧桑。

王家大屋寻遗迹，资水当年哭国殇。

贵州政协韩子栋，“红岩”人物华了良。

千里巡游宣革命，百年史实论兴亡。

回首时危落巢囚，仓皇转徙几人留。

而今忠骨无寻处，惟见资江脉脉流。

东北军长黄显声，西安事变早扬名。

凿壁传声问烽火，陆沉半壁总关情。

捷克普年米乐斯，投身中国革命时。

勤苦学通中外语，畅谈马列见所思。

注：黄显声将军任过东北军军长，英语说得很流利，曾于壁间凿一洞，呼问抗战消息。韩子栋住在隔壁。当时武汉沦陷，倭寇南下，直逼长沙。黄是坚决主张停止内战，联合

抗日的。这也是西安事变的思想主流。

二子与我同囚室，风雨中宵论形势。

冥冥有鬼在窥窗，耿耿此心敢仇视。

西北军团副官长，骂蒋不休惊我梦。

还有副官张醒民，事变始末见证人。

同室交淡虽不久，疾恶刚肠我之友。

每至凄凄风雨夜，担心二子遭毒手。

注：我与杨虎城将军之副官长和副官同室仅三日，副官长日夜骂蒋，对我讲蒋介石被俘后的生活花絮，当时我一一心领神会，未及问知其姓氏，此次韩老来益，告知副官长为阎继明，副官张醒民。

韩老韩尔最强，对敌斗争更多方。

金银山下苦挑水，渣滓洞前愤作狂。

《红岩》作者杨益言，移坐就谈岂夙缘。

重庆狱中斗更惨，枪杆何如笔杆坚。

注一：我与杨益言原不相识，我们访王家大屋后，在迎宾楼就移坐就谈，始知他是在重庆监狱中写出《红岩》这本名著的作者。

注二：重庆解放前夕，黄显声将军在狱中夺枪冲监，惨遭枪杀，事见一九四八年《湖南日报》报导。

烈士前驱见曙光，余生今日敢云忘。

万里河山凭悼念，千秋史册荐馨香。

震惊全省的益阳“双十血案”

陈乐群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国民党益阳县政府举办“双十球赛”，湘北师管区益阳团管区官兵大发枪火，用枪托、皮带、刺刀痛打学生，重伤二十余人，轻伤七十余人，造成震惊全省内外的“双十血案”。

(一)

一九四七年十月，国民党益阳县政府，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虚张声势，笼络人心，掩饰其行将覆亡的惶恐心情，在国民党国庆日，责成益阳县民众教育馆，在县城龙麟镇，举办“双十球赛”。比赛项目分兰球、排球、乒乓球。参加比赛各单位有各机关、团体的职工，学校的师生和部队的官兵。那天，学校、机关都放了假，看球的人比较多，连同摆摊贩的、卖香烟槟榔瓜子的，大约有五、六千人，体育场（现学门口后面）十分热闹。下午二时许，建军队对五英队的比赛拉开了公开组兰球赛的序幕。建军队是由益阳团管区官兵组成的。五英队是由原益阳县各中学的第五区在校学生和县城小学教师混合组成的。其中有资江商业职业学校的学生，也有五福中学的学生。当时在省立五师附小教体育的王介章

老师也参加了五英队。比赛开始，团管区官兵三十余人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站在场外助威，公开提出今天要争个高低。球赛进行到十分钟左右，五英队以十二比四领先，团管区球队慌了张，乱了阵脚，运球失误也增多。这时有个队员急速运球前进，在遭到五英队王介章拦截阻挡中受伤，鼻孔出了一点血，球赛暂停。裁判陈治策、甘校怀查看了伤势，判断为球伤，不是伤人犯规。经裁判说服后，球赛准备继续进行。突然，站在场外助威的团管区少校副官汪春荣眼看败势已定，恼羞成怒，大发枪火，冲进场内，大声嚷叫：“我们已经在战场上流血，在球场上也流血，这是为什么？兄弟们，打吧！”这家伙一声吆喝，同伙暴徒蔡青云如发疯狂，带头逞凶，四周观赛的团管区官兵，个个持枪，蜂拥而入，他们抓住了五英队员，用枪托乱砸，皮带乱抽。球场内外的部分青年学生，眼看团管区暴徒无理取闹，仗势欺人，不忍无端受此冤气，立即奋起回击，登时枪托与扁担齐击，板凳对刺刀乱舞。因学生多系徒手参战，处于不利地位，只得边打边退，从体育场退到了学门口。此时，团管区再派出大批武装追打学生，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小巷之中，到处鸣枪示威，沿街搜索，横冲直撞，抓人打人，一些被抓的学生，一个个被打得头破血流，吓得过往行人满街乱跑，吓得居民闭户，店铺关门。暴徒们从学门口打到二堡，历时两个小时，闹得整个益阳城沉浸在白色恐怖之中。

傍晚，团管区有谭超人等几个青年军官在学门口民众食堂举行集团结婚，楼上摆了十多桌酒席，团管区部分军官正在楼上猜拳饮酒，寻欢作乐。一群学生冲进民众食堂楼上，在食堂工人的帮助下，恰巧找到了汪副官，就此事进行质

同。团管区军官横蛮不讲理，举起枪托打人，学生只得拿起凭椅自卫还击。此时，正在学门口庆洲饭馆帮工的进步工人张文华，见团管区官兵胡作非为，怒不可忍，赶忙动员庆洲饭馆、隔壁三福兴饭店、对门益顺隆油盐杂货店的全体职工，赶到民众食堂支援学生。愤怒的人群冲进楼上，团管区军官见群情激愤，形势不妙，马上跳窗逃跑，几个跑得慢的被群众打了几高凳，打得这些坏蛋向河边逃窜。

(二)

面对国民党反动官兵的杀戮，各中学学生并没有屈服，当晚资江商职学生会就把受伤的钟文明等五位同学送到医院诊治，并派出代表到五师、龙师、信义、豫章、五福等城内各校联系，商议对策要求联合罢课，游行示威，以示抗议。同时还派学生代表去县政府、专署请愿，向工会、商会等群众团体请求声援，向社会各界呼吁，支援学生正义斗争，严惩行凶打人的暴徒，要求国民党当局赔偿损失，保证学生人身安全。

团管区无理打人的消息传到城内各中学，当时绝大多数学生，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纷纷主张罢课罢市，立即采取行动，声援商职学生，反对团管区殴打学生的法西斯暴行。在各校学生自治会的倡议下，成立了“益阳县学联后援会”，联络各中学师生，统一各中学行动，支持商职同学的正义斗争。当时，省立五师学生自治会就召开了各班学生代表会议，大家推选周德辉、方志成、邓星祥、张合盛等为该校“后援会”负责人，（周德辉还被推选为“全县学联会援

会”负责人）随即开会研究方案，除一致决定去医院慰问受伤同学外，同时还印发“快邮代电”，向社会呼吁，联络各中学学生游行示威。五师学生的行动，把国民党益阳县反动头目吓慌了。他们立即派遣特务去五师调查“异党活动”。紧接着反动头目张鸿泰又去五师游说，软硬兼施，妄图阻止学生上街游行，当即被轰了出去。最后，益阳县主要反动头目，县党部书记李仲怀、伪县长田植、县参议长曹云溪亲自出马，邀集五师和其他中学学生会代表到伪县党部举行会议。他们心怀鬼胎，妄图扼杀学生的革命行动。阴谋狡猾的李仲怀，在会上竟威胁欺骗学生说：“省军管区决定派参谋长蔡杞材来处理这件事情，你们没有必要上街游行了。”五师代表熊孝初来个就汤下面，扬言道：“既然蔡参谋长要来，我们就整队去迎接。”决心趁此机会组织一次示威游行，特务分子李仲怀凶相毕露，问他叫什么名字，得到答复后，立即从身上掏出一个小木子，将熊孝初同学的名字记上，同学们见此情景，都知道他是要搞国民党特务惯用的暗杀和绑架那一套了。顿时群情激愤，一声喊打，吓得国民党的党政头目语言哆嗦，他们竟使出了兔子的绝技，一个个从后门溜之大吉。这次斗争，使国民党特务威风扫地，再也不能象以前一样，任意欺压学生和人民群众了。

为了配合各中学学生的斗争，十月十一日晚，张文华秘密联络进步工人张紫云等开会，研究如何趁此机会在全县掀起一次反迫害、反暴行的运动。他们采取兵分两路，一路由张文华负责组织群众配合中学学生向伪县政府请愿，要求严惩凶手；另一路由张紫云负责通知轮船棚子的张建凡和另一位旅棧业同业工会理事，发动罢工罢市。同时

印发传单，散发全城，号召市民起来反迫害、反暴行。由于学校带头罢课，旅棧业带头罢市，致使全城学校停课、商店停业、工厂停工、轮船停开，吓得国民党反动派胆战心惊。

国民党益阳县党部见学生和市民真正闹起来了，感到十分害怕。他们意识到如果硬性压抑学生行动，不仅师出无名，反而会遭到全城学生及各界群众的强烈反抗。于是，团管区司令胡继瑗赶忙邀请各学校校长开会，洽商善后事宜，要求校长出面调停，迅速平息民愤。会后，由五师校长杨朴庵发起，成立了益阳县各界双十事件“后援会”。参加后援会的，除各中学校长外，还有工会、商会等群众团体负责人参加。“后援会”成立后，一方面参与把持和控制学生、防止事态继续扩大；另一方面也作出了一些支持学生正义斗争的行动。如派人去医院慰问受伤学生，调查失踪学生的下落，联名草拟通电一份，列举团管区军官残酷毒打学生的暴行，出面与团管区联系，要求他们向学生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同时还先派学联负责人周德辉、方志成、陈华林为赴省请愿代表，要求省方严惩凶手。

(三)

益阳县学联赴省请愿代表十一日下午进入长沙市，先用电话通知教育厅厅长黄凤喈准备接见，同时拟一新闻稿发往各报社。黄凤喈听完请愿代表的控诉后说：“我已电话约王主席（伪湖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明日在他的公馆接见你们。”十二日清晨，省会各报均刊出了“益阳双十血案”的消息，省会舆论大哗。长沙市各大中学校学生会、益阳旅长

同乡会、各校益阳学生、各报社新闻记者纷纷来到请愿代表的驻地采访、慰问。各地声援电报如雪片飞来，声势浩大，全省为之震动。

十二日上午，请愿代表由黄凤喈陪同乘车抵王东原公馆，会见了王东原，提出了要求惩办凶手、医治受伤同学和赔礼道歉的要求。请愿代表在会见王东原时，有国民党元老丁文安在场。丁文安系益阳人，早年曾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是同盟会会员。当时丁文安听完请愿代表的控诉后，以中央人员的口吻对王东原说：“王主席要治湘有希望，此次惨案，应从速处理，以平民愤。”王东原答复：“军人犯法，按军法处理，我身为军管区司令，如果益阳团管区真打死了学生，报请国防部就地正法。”并要学生代表回益，听候处理。

益阳县学联赴省请愿代表十二日下午五时返回益阳后，正积极酝酿，采取联合行动准备继续斗争。这时，伪县党部赶紧又召开了一次各中学学生代表大会。会上，伪县党部书记李仲怀软硬兼施，又打又拉，表演特别充分。首先，对团管区军官痛骂一顿，样子象对学生十分同情。接着又对学生进行了一番安抚劝慰，然后再用恫吓的口吻说：“目前时局动荡，社会秩序混乱，诸位要严防异党分子趁机捣乱破坏。因此，‘双十事件’要马上结束，不能再闹下去了。工厂立即开工，商店立即营业，学校也要迅速复课，否则一切后果自负。”会后，还唆使其走狗谩骂和威胁学生代表。他们的反革命表演再一次遭到各中学学生代表的痛斥。县学联决心继续进行斗争，立即组织两百多个学生再次向县政府请愿，冲入县衙，当面向县长田植提出质问，强迫答应三条要求：一

益阳花鼓上北京

益阳市花鼓戏剧团 郭莲英

是被打伤的人要诊；二是被破坏的东西要赔；三是打人凶手要严惩。田航不肯答应，说是要报告伪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批示。学生代表揪住不放，立即跟随田航一起来到伪专署，直到专员李支全都答应要求才回来。罢课、罢市、罢工持续到十月十三日晚上，反动政府惶恐不安。十月十五日，伪省军管区不得不派参谋长蔡杞材来益阳进行调解处理。到医学院慰问受伤学生，去各中学向师生赔礼道歉。赔偿了金货铺、民众食堂、庆洲饭馆等被损坏的东西。十月二十日，伪湖南省军管区派主任何法官徐宗陵，湖北师管区派主任军法官鲍永禄来益会审，并邀各机关团体、市民学生列席旁听。受伤学生钟文明等出庭控诉，验明伤势。首犯汪春荣死不认罪，主犯蔡青云亦托病不肯到庭，但罪证确凿，千夫所指，莫能狡辩。十月二十五日，伪湖南省军管区不得不下令将益阳团管区司令胡继璠撤职查办，将肇事者少校部员汪春荣判刑六个月。这次反迫害、反暴行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后记：去年八月，我接受地委党史办交给的征集“一九四七年‘双十惨案’”资料的专题任务后，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先后走访了当事人三十余人次，召开知情人座谈会两次，查阅了省、县、市档案馆所存的有关资料。先后阅读和参考了省政协常委蔡杞材所写的《一九四七年‘双十惨案’始末》、桃江县离休老干部张文华所写的《黎明前的萤火》以及事件当事人邓呈祥、张合盛、王介章、陈华林等同志所写的回忆录。本文记述的是三十七年前的往事，因年月太久，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但它记述的确是三十七年前震惊全省的一件大血案，至今仍有许多人希望知道这个事件的始末。现整理记述下来，以飨读者。

经过“文化大革命”浩劫，我几乎所有的艺术资料都散失了，唯有这张与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合影的珍贵照片保留下来，至今挂在正房墙上。端详着总理慈父般的笑容，我心中就象春风送暖，思绪翻滾。二十多年前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

那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下旬。我们益阳市花鼓戏剧团因为编演现代戏成绩突出，被省文化局调到省会展览演出本团自创大型现代戏《金色的凤凰山》。一天，省文化局突然指示剧团，抓紧一切时间，重排过去上演过的《三女抢板》。于是，剧团连忙对这个戏的演员阵容作了调整，把队伍拉到长沙市青少年宫，日以继夜地赶排。我被安排演三女中的秋萍一角。

紧张排练几天之后，到了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我们正在化装，准备内部彩排。这时，省文化局派人来通知：立即上车，去执行一次重要的演出任务！我们都来不及卸妆，迅速上车，被接到省委蔡园小礼堂。省文化局为这次不平常的演出，已采取各种措施，作了充分准备。我们在化装室刚坐定，只见省湘剧院彭俐俐等几位老师相继而来，为我们几个主要旦角重新化装。刘春泉老师替我化了装。开演前，省文